

李敬泽 著



小春秋

那些人——披发孤独，后无来者，在“海底”、在“河源”，
我看见了他们……

告别“百家讲坛”式戏说 开启国学新实力阅读

新生代文学“教父”李敬泽
锦心绣口解读中国传统经典
胡兰成之后最有味道的文字
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目 录

鸟叫一两声	1
马夫车夫、高跟鞋	2
风之著作权	4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6
那些做不到的事	8
孔门弟子做好事	10
君子之睡眠问题	12
寡人有疾	13
人性与水与耍赖	15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16
勇	19
数学家的城	21
孟先生的选择题	23
圣人病	25
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	27
与盗跖喝酒	29
纪念律师邓析	30
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	32
活在春秋之食指大动	35
活在春秋之抱柱而歌	37
澡堂子引发的血案	39
独不可以舍我乎	41
英雄要离	42
其谁不食	44
伍子胥的眼	45
谎言饲养的王	46
战国策	48
隐于屠	49

办公室里的屈原	50
说难	52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53
三岔口	54
伪经制造者	57
汉语中的梵音——《长阿含经》	61
黑夜之书——《酉阳杂俎》	63
盛大、永恒的城——《东京梦华录》	66
赏心乐事谁家院	69
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陶庵梦忆》	71
事去雨潇潇——《板桥杂记》	73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笑林广记》	76
说八	78
把遗产献给“世界”	81

鸟叫一两声

《诗经》开卷第一首就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大家想必背得出，此处不念了。现在要问的是，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对面那女子脸儿一红，扭捏道：啥意思？相思病呗。

对，相思病，不仅是相思病，还由相思病并发失眠症：“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如果有人问：中国人从何时开始失眠呢？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就是《关雎》，那至少在商朝末周朝初，而且原因正是“女人”。

当然，在《关雎》中，相思病最终痊愈，“窈窕淑女”娶回家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卡拉 OK 估计要唱大半夜，处处啼鸟惊不破三千年前的春梦。

然而，错啦，同学们哪，你们都错了，看看《毛诗序》里是怎么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也”。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皇上的大老婆看见一小女子模样长得俏，然后就睡不着，就急得两手瞎抓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急什么呢？不是急着遣人把小妖精做了，而是急着怎么把她弄进宫来做小老婆，从此东宫西宫左右一心，共同辅佐皇上、治理天下。这是什么境界？是不知人间有醋的境界，真乃“后妃之德也”，真乃男人之福也！

我要是这么解说《关雎》，肯定被人啐得满脸唾沫，但这是《毛诗序》，是关于《诗经》的最权威、最正统的诠释，两千年间无数大人物、无数聪明脑袋都学，而且都信：《诗经》里怎么可能仅仅是男欢女爱呢，那不成了“私人写作”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必定是有微言大义，渭河边那两只鸟必定与朝堂风云、天下大势相联着，联不上拧巴着联，结果就弄出这么一通男性自恋狂的疯话来。

《诗经》是好的，但要看出《诗经》的好，必得把秦汉之后的诠释一概抛开，直截了当地读诗。吟出那些诗篇的人们，他们曾经真实地活着，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看美女就是美女，看了美女睡不着也不会说是心忧天下，等真要为国出征的时候，他们就尽他们的责，

提起弓箭去战斗、去死——那是一种不曾被各种各样大话浮辞所蒙蔽的人生。

“睢鸠”据说是鱼鹰，脖子被系住，鱼叼到嘴里咽不下去，只好再吐出来让人拿去红烧或清蒸。我见过的鱼鹰都是蔫耷耷一副厌世的样子，除了捉鱼，拒绝开口；难怪啊，一种鸟，一辈子遭束缚，叫一声还被解说得云山雾罩、离题万里，如果是我我也懒得叫，我会暗自断定人这种动物是靠鱼和废话噪音生存，我将保持沉默。

但是我相信，在三千年前的某个夜晚，确有一只鱼鹰闲叫了一声：“关！”，另一只应了一声：“关！”，是夜月白风清，儒生、教授、记者、编辑和知识分子们都睡了，只有一个年轻男子睡不着，他听见了那两声，他的心便向渭河去——那条三千年后已经干涸，有时又泛滥成灾的古河。

马夫车夫、高跟鞋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好诗。天下事事“不可”，活着还有甚意思？只剩下雪夜诵《汉广》，其声凉而长。

《诗经》第九篇《汉广》是失败者的诗，如果是成功者，这诗就得改，改成“南有乔木，可休息；汉有游女，可求思。汉之广矣，可泳思，江之永矣，可方思”——汉江、长江拦不住他，江上的仙女归了他，南山上的树替他挡太阳，他走在路上小草都发芽。

可问题是，你这厮都得意成这样了你还写什么诗啊，但凡你有个小心思，上帝他老人家照例批个“可”字，你日子过得吃了泻药般顺畅，你还得写首诗告诉我你真呀么真高兴？

所以，留着《汉广》，给那些过得窝囊、失意的人们，让他们深切地感受自身的软弱、渺小。在那反复、无奈的音调中，软弱变得无限长，像从肉体中抽出一根精神的丝，颤动，闪闪发亮，那是人类命定的、普遍的、绝对的软弱。

是啊，汉水很宽，它不是你的游泳池，长江很长，它不是为了让你行船而横流于地，南山的树不是为你长的，这世界原本不是按你的欲望和目的设计。

可人总是只在失意的时候才会想起生命中原是处处关卡，遍布“不可”。比如《汉广》中那位老兄，眼见着仙女一般的妹妹不知要成了谁的老婆，他想啊想，一片心思乱成了杂草（翘翘错薪），草长这么高就可以割了（言刈其楚），割了这么多草就该拿去喂马，然后，该老兄眼前一亮：“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要是她出了嫁，俺就给她喂马给她开汽车，俺天天看着她总可以吧？

当然不可，你是自己骗自己，马夫车夫和丈夫都是“夫”，可那是一码事吗？所以，该老兄的白日梦刚起了兴就醒了，结果仍然是“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上大学时，一同学狂追西语系的“游女”，每日在寝室炮制情书，极尽做小服低之能事，某日忽得佳句，急召众人共赏，原来是：我愿做你的高跟鞋，随你走遍天涯。听得我一口茶险些喷出去。其时正读《诗经》，便献计道：做美人鞋口惠而实不至，不如像《汉广》那样，做人家马夫车夫倒实在些。

师兄阴笑一声，点着我的榆木脑袋说：嫩了不是？马夫车夫是做得到的，哪能随便就签字画押？高跟鞋，反正也做不成，无效合同；啥是浪漫？浪漫就是无效合同，事儿是做不到但态度有了懂不懂？

十几年后，美女“游”到了那半球的费城，昔日的灰姑娘却把穿了十几年的一只“高跟鞋”遗在了中国，大洋之广矣，不可泳思，已被穿得半旧的师兄叹曰：如今想当人家车夫都不够资格。

他总算知道了，原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在设计时也没把他的位置考虑进去。

风之著作权

《诗经》据说是民间文学，是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我上大学时头脑比现在还简单，闻听此论心驰神往，遥想商周时代，奴隶们一边劳动，一边哼着小曲儿，奴隶主呢，抱着鞭子蹲在田头听，听了觉得好便飞跑到官府去，唱给国王的使者听，国王的使者听了大喜：人民的呼声啊，俺赶紧着唱给大王听去！说着扬鞭拍马一溜烟而去……他要是半路忘了呢？不碍事，人民的歌人民唱，人嘴快过马腿，也许半路上他就又能听到同一首歌。

有一日，我把这番体会跟老师讲了讲，他老人家沉吟半晌，然后用哀我不幸、怒我不争的眼神看看我，曰：

唉，你们这代人啊——

余音袅袅，却不再说了。我等了一会儿，只好讪讪地出门，回了寝室上床思考：为什么老师这么教了我就不可以这么想呢？就算是我想得靠谱了他老人家为啥要怪到我们这一代的头上呢？我认识的同代人加起来也不够一百，这一百人也不曾选我当个班长委员什么的，我怎么就忽然成了他们的代表了昵？

寤寐思服，展转反侧，后来就睡着了。

岁月悠悠，如今，我也到了有资格长叹“你们这代人”的年纪，总算学到了一点人情世故，知道老师的教导必须亦正亦反亦正亦邪地听，至于怎么才能凑巧听对了，那得看你的造化和悟性。比如关于《诗经》，现在我知道，老师的说法不能当真，其中表扬帝王将相和以及他们的祖宗的《雅》和《颂》固然是庙堂之歌，那《国风》恐怕也大多是贵族阶层的无病或有病呻吟。

那么为啥老师要说《诗经》是民间文学呢？因为，老师认为这顶帽子是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表扬，表扬古代劳动人民是肯定没错的，所以对不对先表扬着。而且，《诗经》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除个别篇章之外，没人知道那些诗的作者是谁，既然不是张三不是李四，那么就只好说他是人民或者民间，总之，失物招领，过期充公。

——老师不小心走到了时代前头，或者说，时代未必真的走到了二十年多前我老师的前头。如今在网上，你发帖子留言，落个名叫踏雪无痕或一点红，那其实还是无名，因为无名，一个人的声音就不再是“我”的声音，一个人就变成了不可指认的“我们”，而当他放弃他的名字时，他获得了另外一种权力：他汇入“民间”或者“大众”，他就是“民间”或者“大众”。

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我的老师二十多年前就把它用于《诗经》研究。但是，《诗经》的作者们不署名却未必有如此复杂的想法，商周是奴隶社会，也是贵族社会，那些大人君子们打破脑袋也想不到混入大多数有什么好处。他们不署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他们看不出写篇小文或唱个小曲却要标上自己的名字有多么风光体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著作权的意识，当然也没处收版税去。

著书立说，出名露脸，这基本上是汉代以下人们的想法，特别是司马迁，该先生由于特殊的个人遭际，极具升华冲动，《报任安书》中，一个孤独的血泪淋漓的作者站起来，他将战胜时间和俗世而不朽。从此，每一个会写字儿的人都知道：文章是我的，我将因此被记住。反过来，我要被记住，我就必须写。

当然，现在就更更要写，因为不仅文章是我的，职称和版税也是我的。

而孔子不这么认为，孔老先生也是自我感觉甚好的人，但他毕生述而不作，一本《论语》，不过是弟子们的听课笔记，如果他不幸进了现在的大学，能不能混上个副教授还真是个问题。

在孔子看来，“道”也就是真理，在天地间默然运行，人所应做的，仅仅是谦卑地认识它、准确地转述它。真理如风，正如诗歌如风，如果有一个人长发飘扬，他不会认为这风属于自己，他不会给这风署上标明产权的名字，也决不会因此而骄横虚荣。

——这就是古人的想法，不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头还是后头？

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左传哀公六年，公元前四八九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救之；陈乃小国，长江上的二位老大决定在小陈身上比比谁的拳头更硬。

风云紧急，战争浩大沉重，它把一切贬为无关紧要可予删去的细节：征夫血、女人泪，老人和孩子无助的眼，还有，一群快要饿死的书生。

——孔子正好赶上了这场混战，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吃的是清炖野菜，弟子宰予已经饿晕了过去；该宰予就是因为大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为“朽木粪土”的那位，现在我认为孔夫子骂人很可能是借题发挥：想当年在陈蔡，这厮俩眼一翻就晕过去了，他的体质是差了些，可身子更弱的颜回还在院儿里择野菜呢，而年纪最大的老夫子正在屋里鼓瑟而歌，歌声依然嘹亮，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神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不只宰予一个，子路和子贡就开始动摇，开始发表不靠谱的言论：“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无所丑也若此乎？”

这话的意思就是，老先生既无权又无钱，不出名不走红，四处碰壁，由失败走向失败，混到这地步，他不自杀不得抑郁症倒也罢了，居然饱吹饿唱兴致勃勃，难道所谓君子就是如此不知羞耻乎？

话说到这份儿上，可见该二子的信念已经摇摇欲坠，而且这话是当着颜回说的，这差不多也就等于指着孔子的鼻子叫板，果然，颜回择了一根儿菜，又择了一根儿菜，放下第三根儿菜，摇摇晃晃进了屋。

琴声划然而止，老先生推琴大怒：子路子贡这俩小子，“小人也！召，吾与语。”

俩小子不用召，早在门口等着了，进了门气焰当然减了若干，但子贡还是嘟嘟囔囔：“如此可谓穷矣”——混到这地步可谓山穷水尽了。

孔子凛然说道：“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

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黄钟大吕，不得不原文照抄，看不懂没关系，反正真看得懂这段话的中国人两千五百年来也没多少。子路原是武士，子贡原是商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此时的我们相差不远：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而孔子，他决然、庄严地说：真理就是真理，生命的意义就在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

此前从没有中国人这么说过，公元前四八九年那片阴霾的荒野上，孔子这么说了，说罢“烈然返瑟而弦”，随着响遏行云的音乐，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呆若木鸡，喃喃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当然，如今喝了洋墨水的学者会论证我们之落后全是因为孔子当初没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被人整死，但依我看，该说的老先生已经说得透彻，而圣人的教导我们至今并未领会，我们都是子贡，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而且坚信混得好比天高地厚更重要。但有一点总算证明了真理正在时间中暗自运行，那就是，我们早忘了两千五百年前那场鸡飞狗跳的战争，但我们将永远记得，在那场战争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孔门师徒的乐音、歌声、舞影和低语。

——永不消散。

那些做不到的事

当我们探讨道德之“底线”时，我们是在假设道德如一架通天梯，直入云霄的那一端超凡入圣，而最接近地面的一端，就是底线。底线是最低纲领，我们至少要达到底线，——没敢要求你上到高处去，只比地面高一点点还不行吗？

按照这种梯子论，似乎底线这件事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容易的，基本而容易大家都不能做到，遂痛心疾首，叹世道浇薄。

这里恐怕有个错觉，这种错觉一定程度上是“底线”这个词造成的，它在汉语里意味着最低的条件、最低的限度，而当这个词与道德相连时，“限度”指的就是社会中关于人的行为是否正当的起码的共识或者说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价值。问题在于，这两个“限度”意义是不同的，前一个限度在逻辑上是必要条件，而后一个限度，却未必能构成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说明白点：在道德问题上，基本的未必是容易的，道德底线与其说是我们最易达到的，不如说是我们最易逾越的。

比如全世界的幼儿园里，开宗明义要教的一件事，就是毋说谎，这应该算是底线了吧？但摸着心口想想，如果这是底线，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在底线之下，底线之上的或许只有若干圣人和那些天真未凿的孩子。

再比如，毋偷窃，这件事做到也难，你固然不会——主要是不敢——撬人家的房门，但盗版软件不是用得正气凛然？据说是另有大道理悬在更高处，但是啊，我记得幼儿园老师教育我：别狡辩，赶紧把东西给人还回去，还得老实承认错误。

还有毋杀人，说起来似乎大家无异议，是底线，但人类之为万物灵长，恐怕主要的本事之一就表现在比其他任何物种更善于同类相残——至少其他物种要互相吃还不像咱们这样想出千奇百怪的理由：他是某国人、他是某类人，所以该吃而且吃得正义。

所以，假设现在有一人站在这里，低眉顺眼谦虚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撒谎欺骗背信，我不偷窃，我不贪婪嫉妒，我不杀人，我总算达到了底线，请你们把我算成一个人吧。对此我们会怎么说呢？

我们会认为这件事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就是传说中的圣人。

世界各大宗教，包括我们的孔夫子，苦口婆心、连劝带吓唬，不过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人之为人的基本道理，但这些基本道理做到了，人离圣人或圣徒其实也就不远。所以，我一向不赞成梯子论，这种上层次上境界一步一个台阶的想象有渐入佳境之美，但与人类的真实道德体验和道德实践无关。以为所谓道德底线就是放宽了要求放低了标准，因此大家都会达标，那最终必会失望。

说到底，所谓道德底线，窃以为就是我们能知而难行的那些道理。父母爱孩子，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不成其为底线，因为正常人都能做得到。但不要往牛奶里放三聚氰胺，这件事天下人都知道不对，有关人等在没被抓住之前就是做不到，所以，一旦抓住，国人皆叹：底线何在？官员不要贪污，强者不要欺负弱小，诸如此类大家都知道，是公理是共识，如果民意测验，大概百分之百赞成，但这百分之百里，还是颇有些人偏就做不到。

——顺便说一句，我是从不相信网上搞的那些道德表态，只看统计数字，你会觉得我们是遍地尧舜，但正如以上所说，道德不是靠群众表态搞起来的，这种表态只是证明我们能知，却不能证明我们能行。君不见，《疯狂的石头》里绑票的歹徒也在理直气壮地批评人家不讲道德。

我以为，底线不必费心去找，从来就有。问题倒在于大家或者有人为什么做不到。但这件事，自古不知多少人想白了头，在此再写五百页也未必说得出口午卯丑。于是，打住，乱翻书。正好翻到《诗经》，想起一字曰“比”，倒是可作话头。

孔夫子讲道德，主要的路径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爱你的爹妈孩子，类比一下，也该爱别人的爹妈孩子。这个路径到了汉儒那里，用来阐释《诗经》，所谓“赋比兴”，主要是“比”，由男女调情比到君臣关系，由鸡毛蒜皮比到军国大政，总之，一切都是由近及远，联类推广开去。

所以，《诗经》在古代被用作了道德教材，所要学的自然不是见了俏佳人如何睡不着觉，而是见了俏佳人如何想起天下想起皇上。如果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至少在古代中国，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因为按照孔夫子的规划，这个秩序井然的道德世界就是比出来的，比之本意为鸟之联翩，说白了就是推比联想，由私推到公，由小推到大，由自己的爹推到皇上，理论上，“底线”应是一路逶迤，不绝如缕。

看上去很美，在如今的读经派看来，正可济世救民。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并非人人都是诗人，按照任何一种能量定律，推比的效用都会递减以至于无，比如我知道皇上就好比我的爹，如果我爹在村头被人打了，我一定拎着锄头去厮拚，但如果皇上君父在千里之外京城遭了外族欺负，那老实说，我还得锄我的地。

由私比推公，可能有私德而常常无公义。公义何在我们知道，但问题是公义与我们何干？你倒是拿人家比爹，谁知人家是不是拿你比儿子？

如此，便是爱自己的儿子给别人的儿子吃三聚氰胺，便是一盘散沙，底线荡然。

谈“底线”，终究要谈私人如何成为“公民”。

孔门弟子做好事

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的弟子都是“活雷锋”，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努力做好事。做好事分为两种，一种如颜回，躲在破巷子里哪儿也不去，天天思考人生的意义，有个窝头吃，有一瓢清水喝，颜先生就乐呵呵的了。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做好事，世道这么乱，一个人呆在屋里不出去添乱就是最大的德行。

帕斯卡尔说：世上一切灾难都起于人不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一棵“思想”的芦苇；颜回有芦苇之风，孔子在众弟子中对他评价最高。说起来，孔老先生也有些凡人的毛病，看《论语》就知道，他也喜欢背后议论人，但他对颜回是一贯地夸奖，这可能是因为颜回能做到的，孔夫子本人也做不到。

孔子就是个不肯呆在屋里的人，他要奔走，要实践，总想干点什么，他的大部分弟子都和他一样，很积极，很忙，忙于做官、办外交、做买卖，忙于改变世界。这当然也属于做好事，是做好事中的行动派。

行动派的代表人物是子贡和子路，他们做的好事想必很多，但历史上鲜有记载——古代的史家如同现在都市报的记者，对人性抱着相当阴暗的看法，他们通常喜欢报道坏事——但有几件还是流传下来了，连同孔子的评论。

比如有一次，子贡在外地碰见了一些鲁国老乡，也不知是掳去的还是骗去的，老乡们已经沦为奴仆；子贡是仁人，有不忍之心，况且又是老乡，于是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带回了鲁国。

然而当时的鲁国有一项政策，凡赎回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金由国家财政支付。但子贡在做好事啊，怎么能拿着发票去报销呢？所以，“来而让，不取其金。”

至此，子贡算是把好事做到底了，他完满实现了中国人对“好事”的全部预期，但事情传到孔子那儿，老爷子却不以为然，子曰：都像子贡这样，以后鲁人被拐卖了恐怕就没人再去赎了。

相反的，有一次子路见义勇为，抢救了落水者，被救的人千恩万谢，最后说：也没别的，这头牛你牵了去吧。子路竟不客气，施施然牵着牛回了家。这件事真的有点不靠谱，把好好的一件“事迹”弄的不好报道，但孔子得知，竟大加肯定，断言：鲁国人民从此必将争先恐后地拯救“溺者”矣。

两件好事，两种态度，由此可见孔子对人的道德实践抱着相当现实的态度，他相信人有道德之心，但也相信人有利己的本性，他的意思是，你的境界那么高，高得凡人跟不上，那么德行也可能就变成怪癖，失去了教育意义。

当然，按我的想象，子贡也可能不服气，心里说：做好事还做出错了，都像颜回那样倒是不会出错。可是他做了什么？

孔子则说：都像颜回那样，也就不需要做什么了。

君子之睡眠问题

《易经》《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就是说如果一人他是个君子，德才兼备，人五人六，这时候他绝不能松懈，必须“朝乾夕惕”，从早到晚奋发向上而战战兢兢，如服了伟哥之人，如横过马路之鼠，总之保持肾上腺素的充分分泌，永远兴奋和紧张。

为什么呢？孔子给了两个理由，第一是人当了君子就必须奋发向上，不向上就会退步、堕落，就不再是君子；第二呢，人当了君子就比较招人烦，所以必须战战兢兢，以防小人暗算。

后一个理由的依据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换了庄子，就会说：得，咱也别当君子了，当棵小灌木成不成？但孔子他老人家不这么看，他认为不仅不能当灌木，而且还得越长越高；那么风来了怎么办？除了提心吊胆就只有长成一棵钻天杨，收枝拢杈，别去张牙舞爪地招风。

——都是老掉牙的智慧，而且智慧和智慧之间还要吵嘴，所幸我在此要谈的只是一个相关的小问题：君子之睡眠问题。

做君子，长期兴奋长期紧张，没有一副好身板显然是不行的。春秋时代人的平均寿命顶多三十几岁，孔夫子却活到了七十多，属于古稀人瑞，不作“文化昆仑”“大师”“巨人”真是天都不答应。考察老先生长寿之道，除了食不厌精，热爱旅行，还有一条是反对睡觉——这方面有个“宰予昼寝”的例子：弟子宰予大白天睡觉，老爷子看见了气得什么似的，一口断定“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可怜的宰同学别说是大树了，一觉就把自己睡成了朽木。

这段公案成了现代人打倒“孔家店”时一个颇为煽情的口实。我上初中时正赶上批林批孔，老师愤怒声讨“克己复礼”，大家听了也无甚心得，但讲到“宰予昼寝”这一段，同学们对该老头儿的印象马上就不好，白天睡一小觉，多大个事儿呢？值得这么上纲上线？

后来人长大了，读了《易经》，再读《论语》，读书而明理，终于比较理解孔老夫子的苦心：睡觉在古代的确是个大问题，那时候空

气清新，人的想法又相对地少，大众娱乐活动基本没有，生活全面无聊，一个人就很容易昏昏欲睡，夜里睡了，白天想想闲着也是闲着，再眯一觉，这样下去他就比较慵懒、比较松懈，就比较不容易“朝乾夕惕”，他就只有堕落下去了。

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古典中国的有志青年乃至老年，与睡眠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莫过于“头悬梁、锥刺骨”，那是苏秦在苦读，头发吊在房梁上，一锥子扎进骨头里，知道的，他在读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玩儿 S/M。

话说到这儿，又说回到“古老智慧”：孔子催人上进，这很好，但人太上进了，就难免自虐、变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也就难免别人看你不顺眼。所以，让我选择的话，吾从庄周，我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在不上进，而是两千年来太上进，自己把自己逼拧巴了，所以，重新把自己理顺溜的办法之一，就是睡个好觉，放松，爱怎么着怎么着。

寡人有疾

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又爱钱、又好色，火气又大，对这样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孟轲先生说，好啊，只要百姓吃得饱，只要街上没有老姑娘和老光棍儿，只要一怒而能安天下，那么，您就好货、好色、好勇吧。

读《论语》，我觉得孔子是老人，平和，看清了世间事，当然也有点老人的怪脾气。读《孟子》，我觉得那铿锵的声音出自中年人，他威严、精悍，他必定长一脸络腮胡子，他锐利地盯着你，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以雄辩的言辞考验和召唤你的良心。

孟子是那个时代的良心。孔子生活在他所想像的落日余晖中，而在孟子面前，茫茫长夜已降临，“上下交征利”，“率兽而食人”——在鲁迅之前两千二百多年，孟子就以“吃人”的意象断定社会的兽性本质。也正因为暗夜当前，孟子激烈而坚定，他把一种行动的理想主义气质

注入孔子开创的传统：“仁义”不仅是源于古老记忆的价值，而且成为一种必须为之战斗的社会理想。

对气大声宏的“理想主义者”，我一向怀有疑虑。理想主义是美的，一个人很可能仅仅因为理想主义的美才成为理想主义者，所以当今的“理想主义者”学中文的居多，结果呢，我们看到的大抵是作秀而已。所以，我真正尊敬的理想主义者为数甚少，孟子是其中之一。该先生东奔西走，见过了一连串儿君王，从不谄媚，从未卑怯，他永远居高临下——大众欣赏和热爱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说话的人，比如台上的明星或屏幕上的专家或骂人的作家，但君王们可没有这种自我作践的癖好，所以，孟子的居高临下是危险的，他竟履险如夷。

这需要真正的勇气，而孟子从不缺乏勇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在古代儒生身上时有所见，他们是真的不怕，不仅因为他们胆儿大，更因为他们从孟子那里传承着一个根本信念：在君王的权威之上，另有道德和伦理的权威，凭依着这种权威，他们英勇无畏地捍卫人类生活的基本权利，比如不挨饿，不被欺负，不被人吃。

那些儒生已被忘掉，只有孟子，尽管我们努力忘掉他，他那机智、热情，或严厉如坚金的声音在汉语中依然回响：“五十步笑百步”、“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君子远庖厨”、“与民同乐”、“国人皆曰可杀”……

但响声最大的，可能还是孟子的对话者诚恳的声音：俺有毛病，俺好钱，俺有毛病，俺好色，俺有毛病，俺见了穷人、弱者或者想起远在天边的外国人就压不住火儿，怎么办呢？

孟子沉默。